

编号	675
号	120
政治学院资料室	

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
战史学习参考资料

军事学院

一九八〇年

军事理论研究班战史专业

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史学习参考材料目录

- 3072—1、吳玉章：美蒋和平阴谋的破产
- 3072—2、一九四五年十月三十日《解放日报》社论：停止八十万军队进攻解放区
- 3072—3、周恩来：一年来的谈判及前途（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八日）
- 207—6、刘少奇：在西北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四七年二月二日）
- 3072—4、邓小平：关于解答时局与任务中几个问题的报告（一九四七年六月二十一日）
- 3072—5、陈 毅：一年来自卫战争总结（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三十日）
- 3072—6、一九四六年八月十九日新华社记者评蒋介石军事上的五大弱点
- 3072—7、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四日《解放日报》社论：论战局
- 3072—8、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三日《解放日报》社论：十一月以来的战局
- 3072—9、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四日《解放日报》社论：剥开皮来看——评蒋介石密令
- 80022、中国人民解放战争三年概述（附：肃清蒋匪残余统一全中国诸战役概述）
- 3072—10、朱德：在华野一兵团团以上干部会上的报告
- 3072—11、周恩来：全国大反攻，打倒蒋介石（一九四七年九月二十八日）
- 207—5、周恩来：在西北高干扩大会上关于全国战争形势的报告（一九四八年一月十一日）
- 3072—12、彭德怀：关于陕北九个月作战的基本总结（一九四八年一月十一日）
- 3072—13、刘伯承：千里跃进大别山
- 3072—14、叶剑英：伟大的战略决战
- 3072—15、一九四七年七月一日新华社社论：努力奋斗迎接胜利——纪念中国共产党创立二十六周年
- 3072—16、一九四八年七月十六日新华社社论：祝五路大捷
- 3072—17、一九四八年八月一日新华社社论：中国人民解放战争两周年的总结和第三年的任务
- 3072—18、战争第三年军事计划
- 3072—19、目前形势和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一九四九年一月八日）
- 3072—20、中国人民解放战争重要战役一览表
- 3072—21、四大家族官僚资本发展的顶峰
- 3072—22、朱学范：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统治区工人阶级的悲惨遭遇及其反美蒋的英勇斗争

- 3072—23、水深火热中的国民党统治区的农民
- 3072—24、在美蒋联合压迫下民族资产阶级所遭受的毁灭性打击
- 3072—25、沙英：空前壮大的蒋管区人民武装
- 3072—35、解放区农民对解放战争的伟大贡献
- 3072—36、中共中央发言人斥杜鲁门援蒋咨文〔附〕美帝援蒋初步统计

美蒋和平阴谋的破产

——解放战争初期的一段回忆

吴 玉 章

还在抗日战争后期，美帝国主义即加紧了对中国内政的干涉，妄图在战后代替日本的地位，把中国变成它的殖民地。蒋介石依靠了美帝国主义的支持和援助，不积极准备力量，以反攻日寇，收复国土；却处心积虑地在那里布置阴谋，准备内战，坐待胜利到来之时，好从峨眉山上杀下来，一举把共产党、解放军消灭，以恢复其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反动统治。对于蒋介石的反动阴谋，中国共产党早已洞若观火。毛泽东同志在《论联合政府》中即曾发出了严重的警告：“国民党主要统治集团现在正在所谓‘召开国民大会’和‘政治解决’的烟幕之下，偷偷摸摸地进行其内战的准备工作。如果国人不加注意，不去揭露它的阴谋，阻止它的准备，那末，会有一个早上，要听到内战的炮声的。”

1945年8月8日，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对日宣战。在苏联红军的坚强打击下，日本帝国主义被迫宣布投降。抗日战争胜利了！经过八年艰苦奋斗、流血牺牲的中国人民，听到抗战胜利的消息，该是多么的兴奋啊！但是，就在这个时候，蒋介石却一面下令解放军“应就原地驻防待命”，不许解放军进行反攻、收复失地；一面又令敌伪军“负责维持地方治安”，以待蒋党去“接收”。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实行蒋日合作与蒋伪合流，其目的不但要独吞抗战胜利的果实，而且还想进一步从根本上把中国共产党和它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加以消灭。

但是，由于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在抗战胜利的时候，中国人民革命力量已经非常强大了。解放区已经拥有一亿以上的人民；解放军已发展到一百万人，并有民兵二百多万；中国共产党已成为拥有一百数十万党员的大党，而且政治上已经成熟，它完全能领导全国人民，越过前进道路上的障碍，把革命事业引向胜利。针对着蒋介石国民党的“寸权必夺，寸利必得”的反动方针，毛泽东同志于1945年8月13日在延安干部会上所作的《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讲演中，提出了“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革命方针。根据这一方针，我们一方面要力争和平，反对内战；一方面又要对蒋介石发动全国规模内战的反革命计划，作充分的准备。就是说，对帝国主义和反动派不抱幻想，不怕威胁，坚决保卫人民的斗争果实，努力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

正因为中国共产党采取了坚定不移的方针，而这时国内人民和国际舆论又都反对蒋介石进行内战，同时蒋介石也觉得他进行全面内战的准备工作还没有完全做好，还需要

一些时间，以便把更大量的军队运到内战前线去，因此他决定要玩弄一次和平阴谋。于是，这个靠内战起家、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刽子手居然装扮成和平妖怪，竟于8月14日、20日和23日，一连发出三次电报，邀请毛泽东同志去重庆谈判“和平”。这分明是耍的鬼把戏，应不应该理它呢？毛泽东同志认为：为了尽一切可能争取和平；为了揭露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阴谋，以团结和教育广大人民；我们应该去。如果我们不去，就恰中了蒋介石的诡计，他正是希望我们不去，以便借此说我们拒绝和平，发动内战。因此，毛泽东同志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毅然决定飞往重庆。听说毛主席要去重庆，延安的广大军民都非常担心。因为中国历史上曾有过许多“鸿门宴”之类的故事，而蒋介石对待李济深、胡汉民等人的流氓手段^①，人们记忆犹新，人们为毛主席担心并不是没有根据的。但是，毛泽东同志正确地分析了当时国际、国内的形势，认为有强大的人民力量特别是解放区的力量作后盾，蒋介石是难于重演南京汤山的旧戏的。就在毛泽东同志快要起身的时候，戴老（范文澜同志的爱人）还赶来对我说：“请告诉毛主席，我们劝他千万别去呀！”在临上飞机的一刻，我转告了范老夫妇的意见，毛泽东同志笑了笑，说道：“谢谢他们的好意，我注意一点好了。”就这样，毛泽东同志于8月28日下午，由周恩来、王若飞等同志伴随，在千万人民的欢呼声中，到达了重庆。

毛泽东同志的降临，使重庆整个山城为之沸腾，使整个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都充满了希望。无数的工人、学生和市民热烈地欢迎毛主席，把毛主席称为中国人民的救星。许多人为此感动得流泪。柳亚子兴奋地写出了他新的诗章^②。善良的人们是如此渴望和平，他们哪里知道蒋介石的葫芦里装的完全是“和平”的假药。

毛泽东同志的到达重庆，完全出乎蒋介石的意料。由于他事前对谈判毫无准备，所以我们的代表一去，就把他弄得手忙脚乱，在政治上完全陷于被动。蒋介石虽然派了王世杰、张群、张治中、邵力子为代表来和我党的代表周恩来、王若飞同志进行会谈，但他们对谈判并无诚意，只不过成天地虚与委蛇，一切的提案都要由我们提出，他们只是消极地应付而已。而且，就在毛泽东同志飞抵重庆的第二天（8月29日），蒋介石就密令各战区印发他在1933年所编写的罪恶手册——“剿匪手本”。9月17日，蒋介石又密令送发这些手本（密令和手本均被我缴获）。同时，国民党军阀锡山部对我晋冀鲁豫解放区上党地区的进攻，也在9月间就开始了。

经过四十多天严肃的谈判斗争，蒋介石迫于国内外的形势，不得不在表面上接受我党提出的和平团结的方针，不得不虚伪地同意结束训政、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保障人民自由、保障各党派平等合法地位、严禁特务活动、释放政治犯、积极推行民主的地方自治、改革和裁减全国军队、严惩汉奸、解散伪军等主张。所有这些，都写在国共两党代表于1945年10月10日签订的“国共双方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上面。这有什么好处呢？毛泽东同志说：“这样很好。国民党再发动内战，他们就在全中国和全世界面前

① 1929年蒋桂军阀战争前夕，蒋介石扣押李济深于南京之汤山。1931年因所谓“约法”问题的争执，胡汉民亦在汤山遭蒋软禁。

② 柳亚子的诗写道：“阔别羊城十九秋，重逢握手喜渝州。弥天大勇诚能格。遍地劳民战尚休。霖雨苍生新建国，云雷青史旧同舟。中山卡尔双源合，一笑昆仑顶上头。”

输了理，我们就更有理由采取自卫战争，粉碎他们的进攻。”

为了争取和平，为了争取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中间人士的同情，以击破国民党反动派的造谣污蔑，我党在谈判中也作了一些必要的让步。我们同意让出广东、浙江、苏南、皖南、皖中、湖南、湖北、河南（豫北除外）等八个解放区；同意按比例缩编我们的军队，如果国民党真的肯把它的军队缩编为一百二十个师的话，那末我们可以把解放军缩编为二十个师，只占全国军队的七分之一。但是，国民党的目的是要根本消灭解放区和解放军，因此关于解放区政权和军队的问题，始终未能达成协议。重庆谈判的经验再次证明，政权和军队问题是革命的根本问题，因而成为革命和反革命斗争的焦点。谁如果忘记了这一条，谁就要犯严重的错误。

由上可见，我党在谈判中虽然作了一些让步，但这些让步都是有原则的，并无损于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而在涉及根本利益的问题上，我党则不惧任何威胁，始终坚定不移，毫不退让。而且，在谈判期间，我们丝毫没有放松警惕，我们对国民党的内战阴谋，作了必要的准备。在党中央的一次会议上，少奇同志（他当时代理主席的职务）就提出要把南方的一些部队调往北方，这样既可巩固北方的解放区；又可使这些部队在内战一旦发生，不致孤悬敌后，被人吃掉；同时对谈判也有好处。这个意见在征得毛泽东同志的同意后实行了。这时，我们在解放区尤其是新解放区正放手发动群众，由反奸反霸而减租清算，群众运动在轰轰烈烈地开展，有的地方，农民甚至自发地起来解决土地问题。这样，自日本投降后，解放区不但迅速地扩大了，而且从根本上巩固起来了。正因为我们一方面参加和谈，一方面又准备自卫，我们才能够立于不败之地。

“双十协定”虽然签订了，但蒋介石丝毫不打算遵守。“双十协定”于10月12日公布，13日蒋介石就对其部下颁发了“剿匪”密令，命令他的将领，要遵照他所订的所谓“剿匪手本”，“督励所属”，对解放区“努力进剿”，“迅速达成任务”，这就是说，他已下令对解放区发动大规模的进攻。

但是，蒋介石的军事进攻，在解放区军民英勇的反击下遭到了可耻的失败。10月中旬，进攻我上党地区的阎锡山部国民党军三万余人被我军全部歼灭，连其指挥官第十九军军长史泽波等许多高级将领皆被我军俘虏。这就是著名的上党战役。10月底，我军在规模更大的平汉战役中，在邯郸地区消灭了沿平汉线进犯我晋冀鲁豫解放区的国民党军七万余人，共高级将领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八军军长高树勋于战场举行起义；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四十军军长马法五等人则被迫放下武器。

解放区军民的胜利也推动了国民党统治区反内战运动的高涨。11月19日，重庆各界成立了反对内战联合会。25日，昆明举行了盛大的反内战集会，由于国民党反动军警的横暴干涉，激起了昆明数万学生的总罢课。至12月1日，便发生了举世震动的“一二·一”惨案。接着，全国各地都爆发了为援助昆明学生的游行示威，一个以学生运动为主的反内战运动，一时席卷了整个国民党统治区。

中国人民反对内战的坚决斗争，迫使美帝国主义不得不改换其干涉中国内政的手法。11月27日，美国政府宣布调回其臭名昭著的驻华大使赫尔利，另派马歇尔以特使名义来华“调停”中国内战。很显然，美帝国主义妄图亲自出马，指挥着蒋介石国民党来共同串演一出“和平”的活剧。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在12月于莫斯科举行的苏、美、英

三国外长会议上，美国才同意了苏联一再坚持的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重申不干涉中国内政的政策。

由于上述三方面的原因，既解放区军民自卫战争的胜利、国民党统治区人民反内战运动的高涨和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对中国问题的决议，特别是由于第一方面的原因，蒋介石才被迫同意召开“双十协定”中规定的政治协商会议。

我党出席政协会议的代表为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叶剑英、陆定一、邓颖超和我，共七人。这时董必武同志已在重庆。（叶剑英同志后来参加了军事调处执行部的工作，由秦邦宪同志代替他为政协代表。）我们在周恩来同志的率领下，于12月16日飞赴重庆。重庆，这个我曾经生活和斗争过多年的故乡城市，却一直呻吟在黑暗的反动统治之下，如今我又从革命的圣地延安归来，我到达重庆的时候，心里充满了无限的感慨。

我们到重庆后，即向国民党提出：必须在政协开会之前，实行无条件停战。国民党在当时军事政治都处于不利的情况下，被迫同意了我们的主张。1946年1月10日，我党中央和国民党政府同时下达了停战的命令，并规定这一命令于12日起生效。但是，蒋介石在停战令公布之前，却先向他的军队发出了“抢占战略要点”的密令，这就清楚地证明了蒋介石绝不肯真心停止内战，只不过是耍利用停战来作为其进行内战的烟幕罢了。

与发布停战令的同时，政治协商会议也于1月10日开幕。参加政治协商会议的各方代表共三十八人，其中国民党八人、共产党七人、民主同盟九人、青年党五人、无党派人士九人。它的成分极为复杂，大致说来，可分为左、中、右三种势力。左派即革命派，以共产党为代表，它代表着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利益，主张推翻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右派即反动派，以国民党为代表，它代表着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坚持一党专政的法西斯统治；中间派也可以说是改良派，它主要地代表着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幻想在中国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旧民主主义，民主同盟基本上属于中间派。这时的青年党已公开脱离民主同盟，成了国民党的附庸；民社党虽然表面上还留在民盟里面，实际上也属于右派的势力。在无党派人士中，既有左派，也有右派，而以中间派居多数。我们的方针是争取团结中间派以便和反动派进行斗争。

这次会议前后共历时二十二天，开了十次全体会议和许多次分组会议。（分组会有政府组织、施政纲领、军事问题、国民大会和宪法草案等五个组，我参加的是宪法草案组。）无论在全体会议上和分组会议里，都充满了斗争。争论的焦点仍然是军队问题和政权问题，即所谓军队国家化和国家民主化的问题。

国民党反动派及其仆从提出了“军队国家化”的问题，说什么必须先有军队国家化，然后才能政治民主化，企图以“民主”作钓饵，来勾去人民的军队。针对着蒋介石的这一阴谋，我党指出：要想实行军队国家化，必须首先实行国家民主化与军队民主化。即是说要把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国家变为民主的国家，要把蒋介石私人军阀的军队变为人民的军队。在这两条原则的尖锐斗争中，有些中间派人士居然想走“第三条道路”，他们幻想国共双方都交出军队，由他们来代表“国家”加以接收。但是，天地间哪有这么便宜的事情呢？他们的幻想终于落了空。

关于国家民主化的问题，争论也是一样的激烈。国民党既不愿在当时把它的独裁政府改组为民主联合政府，只希望以扩大几个政府委员之类的办法来搪塞全国人民的压

力；也不愿在以后实行真正的民主与宪政，只想在旧国大代表仍然有效和所谓“五五宪草”的基础上，作点换汤不换药的改变；不仅如此，它甚至妄图在“统一国家主权”的名义下，把解放区一口吞掉。针对着蒋介石的这一阴谋，我党一方面坚持要实行地方自治，各省民选省长，自制省宪，以此来保障解放区新民主主义政权的存在和发展；另一方面则要求把国民党反动政府改组为真正的民主联合政府，并且要在它的领导之下，召集真正的国民大会和制定真正民主的宪法，以此来结束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为人民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创造一些条件。在这个问题上，某些中间派人士注意的中心是政府委员的分配以及什么总统制、内阁制之类的东西，也就是说，他们争的是旧民主主义和个人的地位，并不是新民主主义和人民的利益。

经过一场尖锐的斗争，政治协商会议终于通过了关于政府组织、施政纲领、军事问题、国民大会和宪法草案等五项决议案。这些决议虽然离我党的要求还很远，但却在不同程度上有利于人民而不利于蒋介石的反动统治。

政协会议的召开和政协决议的公布，使全国人民特别是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欢欣鼓舞，不少的人都以为中国从此即将走上和平民主的新阶段。其实蒋介石只不过是利用政协来进行和平欺骗，以配合他这时正在那里进行的全国规模的内战准备。

对于蒋介石的一切，我党从来不抱任何的幻想。蒋介石曾在政协会议的开幕词中提出了所谓给人民自由权利、各党派平等合法、推行地方自治和释放政治犯等四项诺言。在要求国民党释放我们被捕同志的时候，我们曾反复考虑，是开出一大堆的名单好呢，还是只提出个别的同志？我们估计到国民党的反动性，认为把某些同志提出来，不仅不能使他们得救，甚至反而会引起国民党对这些同志的注意，增加他们的危险。因此，我们最后只提出了廖承志和叶挺两位同志。此外，我们还提出要释放张学良将军。果然不出所料，国民党虽然惧于全国的舆论和我党的力量，不得不把廖承志同志和叶挺同志放了出来，而对其他同志则一个也不放，甚至连张学良将军（虽然当时各界人士都提出了释放张学良的要求），它也不肯释放。所谓释放政治犯，原来是一个骗局。

还在政协会议开会期间，国民党特务就开始了对政协的破坏活动，沧白堂事件^①和搜查民盟代表黄炎培住宅的事件都是在这时发生的。而当政协会议闭幕后，2月10日，重庆各界人民正兴高采烈地在较场口举行庆祝政协成功的大会时，国民党特务却大打出手，在会场上打伤了郭沫若、李公朴等六十余人，这就是轰动一时的较场口事件。接着，22日国民党反动派又无耻地在重庆制造反苏游行，组织特务流氓捣毁了我新华日报营业部，并把我们的工作人员杨黎原等同志打得遍体鳞伤。与此同时，民盟机关报——民主报的营业部也遭到特务们的捣毁。类似的挑衅事件，一时曾遍及国民党统治区。所有这些，都证明国民党已蓄意撕毁政协决议。果然，在3月上半月召开的国民党的二中全会上，蒋介石就公开声明，对政协决议要“就其荦荦大端，妥筹补救”，就是说要从根本上加以修改和撕毁。3月下旬至4月初，国民党又召开了它御用的国民参政会的四

① 政治协商会议进行期间，重庆各界人士每晚在沧白堂集会，听取政协代表报告开会情况，1月15日——24日，国民党特务曾多次捣乱会场，人们把这称为沧白堂事件。

届二次会议。在这个会议上，蒋介石发表了又长又臭的演说，大弹其反动透顶的法西斯的法统论之老调，表示要坚决撕毁政协决议和8月27日刚订立的东北停战协议。至此，蒋介石发动内战的阴谋已经昭然若揭了。

蒋介石这一套阴谋诡计，都是在美帝国主义的导演下进行的。美帝国主义一面用各种方法支持蒋介石打内战，特别是用海军把大量的国民党军运到了内战前线；一面却装作“和事佬”来进行“调处”。马歇尔一开始就只主张在关内停战，不主张关外也停战，他和蒋介石一样，妄图让国民党军占领东北后，再集中力量到关内来消灭我们。当时设立在北平的军事调处执行部和它派出的执行小组，虽然是由美、蒋和我们三方面组成的，但美国人总是站在蒋介石方面，拿“调处”来为蒋介石的军事服务。哪里对国民党的军事不利，执行小组就被派到那里去，以阻止我军的前进，和挽救国民党军的失败；而当国民党军发动进攻时，执行部却任意不理，或借故拖延，不去调处，以便国民党军放手进攻，取得某些军事上的便宜。美帝国主义的这套把戏，一时确曾欺骗了一部分人，特别是某些所谓中间人上。但到后来，它的马脚就逐渐露出来了。

对于美、蒋的阴谋，我们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我们一方面和它们进行谈判，一方面又不断揭露它们的阴谋。例如对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上的演说，我们解放日报就发表了著名的社论——《驳蒋介石》，彻底地揭穿了他恶毒的阴谋，狠狠地打击了他疯狂的气焰，把他驳得体无完肤。但是，更重要的，还在于壮大我们解放区的力量。这时，为了充分发动群众，我们已放手让农民去解决土地问题，为此，我党中央曾于5月4日发布了具有重大意义的“五四指示”。在群众发动的基础上，解放军的实力得到很大的发展和巩固。

我们虽然主要地依靠解放区的力量，但同时绝不放弃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斗争。由于国民党政府要“还都”南京，我们的代表团也必须迁移，我党决定把四川省委公开出来，以便进行统战工作和对国民党作斗争。4月30日，周恩来同志在重庆最后举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公开了省委，介绍我和王维舟同志是省委的正副书记。周恩来和董老等同志离开重庆后，没有他们的直接领导，我们更感到自己肩上担子的沉重了，但是，我们省委的全体同志都很有信心，愿意兢兢业业地去完成党所交付的光荣任务。

省委一经公开，我和王维舟同志即四处活动，争取在事实上得到合法的地位。5月19日，冯玉祥在重庆北碚召开了一个张自忠殉国的纪念会，我们故意用省委的名义送了一付挽联，写道：“已使日寇灭亡，忠魂可慰；再令生灵涂炭，人民何堪？”由于这付挽联被放在灵堂中最显著的地方，而各报纸又纷纷加以报导，因此引起了国民党的注意。国民党重庆市党部打电报问国民党中央：“为什么允许他们公开？”国民党中央令其重庆行营查复。这时，行营主任张群不在，国民党重庆市长代行营主任张笃伦跑来找我，他说：“你们公开，我是知道的，但手续不周到……你看该如何电复中央呢？”他言词中有责难之意。我于是立即向他指出：“第一，蒋介石在政协开幕时答应的四项诺言中，有各党派平等合法的一条，我们的公开是有根据的；第二，中国共产党是有组织的政党，我们在这里有办事处，有报馆，有党员就应有党的组织；……我们的理由是很充足的。”张笃伦无法，只好说：“我就这样回复中央吧。”经过这一番压迫无效之后，事实上，我党的公开，国民党官方已被迫承认了。

但是，这时的情况已十分紧张。国民党在美帝国主义的帮助下，已侵占我东北的四平街、长春和永吉等地。而且它对我中原解放军的大举进攻，也如箭在弦上，即将开始。我们办事处的门前屋后，这时也是军警林立，岗哨如麻。而且国民党的报纸天天造谣：或说王维舟同志已到川北搞武装，或说我们要在重庆搞暴动，企图以此为借口来搞我们。我们沉着地应付了这种局面，我对张笃伦说：“请你们注意，我们是不会在这里搞暴动的，但他们（指特务）如果要搞我们，那末，对地方上是很不利的。”重庆国民党各机关为此曾开会讨论，有人主张搞我们，张笃伦考虑到自己的利害，说道：“没有中央的命令，不能搞。”就这样，我们暂时地渡过了这场风险。

为了便于应付更为困难的环境，经过审慎的研究，我们决定王维舟同志撤走，同时还疏散一大部分同志。王维舟同志在重庆，他们害怕；王维舟同志要走，他们又故意为难，不给飞机票；国民党反动派就是这样的毫无道理。为此，我去找张群，张群是国民党反动派政学系的首脑之一，我很早就认识他，他为人极圆滑。我一提出要求，他立即答应第二天送来飞机票。张群的话很有意思，他说：“王是搞军事的，他不走，大家不放心。你倒不要紧。”张群在无意中说出了真心话。啊！原来反动派害怕的就是武装斗争。好，让我们在战场上狠狠地教训他们吧。

到6月间，时局更加恶化了。美帝国主义在这时提出了所谓“军事援华法案”。国民党反动派则向我们提出五项荒谬的要求，要求中国人民解放军退出下列各地：一、陇海路以南的一切地区；二、胶济线全线；三、承德和承德以南的地区；四、东北的大部分；五、1946年6月7日以后解放区人民武装在山东、山西两省从伪军手里解放出来的一切地区。国民党反动派企图强迫我们屈服。而且在谈判过程中，蒋介石竟提议把国共谈判的最后决定权交给马歇尔。对于这些狂妄的要求和无耻的建议，我党表示坚决的拒绝。6月22日，毛主席发表了反对美国“军事援华法案”的声明。美、蒋看到它们的威胁手段和欺诈伎俩都无从得逞，于是蒋介石摘下面具，于6月26日大举围攻我中原解放军，开始了全国规模的内战；而马歇尔也宣告他的“调停”失败，让蒋介石放手来打我们，露出了他的帝国主义者的原形。7月12日，国民党军五十万人在安徽来安至江苏南通的八百里战线上对我苏皖解放区展开进攻。至此，全面内战爆发了。

对于美帝国主义的加紧干涉中国内政和蒋介石的扩大内战，全国人民异常愤慨。6月23日，上海工人、学生及其他各界人民十万余人为了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并推出马叙伦等人为代表赴南京请愿。马叙伦等人行抵下关车站时，遭到了特务匪徒们的殴辱，以致多人受伤，造成了“下关惨案”。这时，我们在重庆也发动了一个反内战的签名运动，这一运动，极其广泛，包括各界著名人士在内，参加签名者达三千余人。实业界、银行界的签名也很踊跃。宗教界也卷入了运动，佛教会为此做了三天道场，回教、天主教、基督教也都做了和平祈祷。

于是，蒋介石加紧了他对民主运动的镇压。7月11日和15日，民盟领袖李公朴、闻一多在昆明先后遭到国民党特务的暗杀。消息传来，人们不胜悲愤。一时重庆的政治空气极为紧张，有些民主人士感到恐怖。为了打击国民党的反动气焰、稳住我们在重庆的革命阵脚，我们决定筹备一个盛大的追悼会，以鼓舞士气，振奋人心。但是，由谁来发起呢？如果由我们发起，参加的人很难广泛。就是民主人士发起，也有许多人不敢参加。

正在踌躇之际，恰好张群到重庆来了。由于国民党内部的重重矛盾，张对特务系统也有所不满，因此蒋介石要他去昆明查讯李闻案件，他却拖延不去。而且这时重庆的国民党部和三青团之间正闹内讧，它们对外的力量并不集中。我们正好利用这种情况来开展工作，于是决定拉张群来领衔筹备追悼会。经过邓初民、史良和鲜特生到张群那里去反复劝说，张为了装点面子，借此捞点政治资本，便同意了领衔发起并作大会主席。这样，参加的人就多了。28日，盛大的追悼会按计划举行。人们看见有张群、胡子昂等人参加，而且由张群主席，顿时自由了一些。会上，张群、邓初民、史良等人和我都讲了话，胡子昂在讲话中三呼要和平，博得了热烈的掌声。而且，由于讲演的人们又一再提及陶行知日前（25日）在上海因愤激而死的消息，使全场的情绪更加悲愤。随后，我们又开了陶行知的追悼会。这样，就把重庆的革命空气提高了。

由于我军采取的是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方针，我军的目的在于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而不计一城一地之得失，所以在战争初期，国民党军还能以极其惨重的代价（例如头三个月它即损失了二十五个旅的兵力），暂时换得侵占我解放区一些城市和地方表面的胜利。但是，这些“胜利”却使蒋介石的头脑发昏，他竟不顾我党的严重警告，于10月初猛力进攻我晋察冀解放区的首府张家口。11日，我军自张家口撤出，疯狂达于极点的蒋介石于当日下午即下令召集违背政协决议的独裁的伪国民大会。其实，侵占张家口已是国民党军进攻的顶点，这一“胜利”正是它失败的开始，从此以后，它的攻势即逐渐下降，而且我军很快即将它的所谓全面进攻粉碎了。

为了召开伪国大，国民党不惜用高官厚禄和大量金钱来对中间人士进行收买。于是，那些醉心于利禄的官僚政客和无耻文人，一个个都脱下了“中间”的伪装，现出了反动的原形。而且也确有一些中间人士，在国民党的利诱特别是在它的威胁之下发生过动摇。青年党就不用说了，那批逐臭的狮子狗^①为了争着当国民党政府的部长和委员，真是丑态毕露，出尽洋相，因而受到全国人民的唾骂。民社党这时也暴露了它的封建官僚和洋奴买办的本性，张君勱彻底地自我出卖了，被人呼为“张君卖”，而所谓社会贤达的王云五、傅斯年、胡霖等人，也跳入了国民党的火坑。至于美帝国主义所豢养的胡适之流，则早已做了蒋介石的过河卒子^②。这时，罗隆基、范朴斋等人也大肆宣嚷，说什么中间派必须对双方都骂，不宜左袒。范朴斋这人很讨厌，成天在张澜那里挑拨我党和民盟的关系。但是，由于全国人民都一致反对伪国大，把它视同猪仔国会，因此，民主同盟和绝大多数怀有正义的中间人士，都接受了我党的劝告，终于和人民站在一起，拒绝了去出席伪国大。民盟主席张澜是我的旧友，他自8月18日在成都举行的李公朴、闻一多追悼会上被特务分子殴打后，对国民党反动派益增不满。10月初，他来到重庆，住在“民主之家”。（即鲜特生的住所“解园”，当时为民主人士经常聚会之处，被称为“民主之家”。）从此我们经常见面，关系十分密切，而这时范朴斋又到上海去了，他更容易接受我们的意见。伪国大开会前夕，无党派人士邵从恩来到重庆，想去南京。他

① 青年党在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出版的机关刊物叫《醒狮》，所以人们把它的党徒称为狮子狗。

② 胡适为了表明自己的反动决心，曾说：“做了过河卒子，只有拼命向前。”

对我说，他到南京去不是出席伪国大，而是要“说服”蒋介石恢复谈判。我劝他别去，他正犹豫，张澜故意说：“要去我们同路。”就这样，我们把他留住了。

11月15日，在举世咒骂声中，蒋介石悍然宣布伪国大开幕。参加伪国大的尽是狐群狗党和无耻之徒，连美帝国主义的《纽约先驱论坛报》也不得不说“听蒋主席报告的都是反动分子”。就是这批反动的猪仔，居然通过了一部遭臭万年的伪宪法。12月28日，我党郑重地声明：蒋记国大和它制订的蒋记宪法均属非法与无效。同时，中国民主同盟、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等民主党派和全国许多人民团体都先后声明绝不承认伪宪法。于是，国民党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扮演出来的伪国大，遭到了全国人民的嘲笑，而它所装模作样地通过的伪宪法，在全国人民眼里也一文不值。蒋介石本来想利用伪国大来孤立我们，但现在弄巧成拙，反而把自己孤立起来了。

蒋介石一面加紧反对人民，一面又加紧进行卖国。11月4日，国民党政府和美帝国主义签订了前所未有的卖国条约——“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这一条约较之袁世凯、段祺瑞以至汪精卫所订的卖国条约，均有过之而无不及。蒋介石的驻美大使、著名的卖国外交家顾维钧竟无耻地声明：“按照中美商约，全中国领土均向美国商人开放。”根据中美商约以及其后的一系列协定，美帝国主义已经从蒋介石手中把中国的许多根本主权席卷而去。美帝国主义既然这样毫无忌惮地干涉中国的内政和侵略中国的主权，那末，它的伪善面具很自然地就要被揭穿，一个强大的反对美帝国主义的爱国运动是一定要兴起的。果然，到12月下旬，圣诞节前夕，美军在北平强奸北大女学生的暴行，终于引起了从北平开始的包括各地城市的全国规模的“抗暴运动”。从此，国民党统治区的革命运动又走向新的高潮。蒋介石不仅在前方碰到了英勇无比的解放区军民的坚强战线，而且在他的后方，又出现了一条波澜壮阔的人民运动的强大战线，蒋介石已逐渐陷入全民的包围中，再也无法逃脱其死亡的命运。

面对着中国人民强大的反美运动，美帝国主义感到它的一切阴谋诡计已再难得逞，于是，马歇尔在政协会议周年前夕，即1947年的1月7日，灰溜溜地夹着尾巴逃回了美国。他虽然在离华之前，还发表了一通颠倒黑白的声明，但已经觉悟起来的中国人民，再不是花言巧语所能欺骗的了。一年间的变化是多么巨大啊！

代 号	3072-1
出版日期	1981年 2 月
全书共计	9 面

停止八十万军队进攻解放区

(一九四五年十月三十日)

《解放日报》社论

双十协定以后，中国共产党忠实地履行自己所允许的让步，命令江南新四军迅速北撤，再度表现了言行一致、相忍为国的伟大精神。全中国同胞都希望国民党当局也能真心诚意地履行双十协定，使全国和平得以早日实现。可是半月以来，国民党军队对解放区的包围进攻，不但没有停止，而且规模反而日益扩大了。根据最近各地电讯，南自广东，北至察绥，在广大的国土上，有八十万以上的国民党军队，向各解放区进行着攻势。仅就平汉道清一线来说，国民党军队就集结了二十几万兵力，在胡宗南、孙连仲指挥之下，配合敌伪，汹涌北上，十余天来就连续夺去了汤阴、获嘉、辉县、磁县等重要的解放区县城。傅作义部十万人进攻张垣，李延年陈大庆部数万之众大举进犯山东解放区，李品仙部进犯两淮，阎锡山、胡宗南部进攻太行及正太沿线解放区，豫西、鄂东八路军、新四军和东江抗日纵队，都被大举围攻。这些只是一些较大的例子，说明内战已在事实上存在，和平前途还受着严重的威胁。

为了配合这样大规模的进攻，国民党军政大员及宣传机关也动员起来，制造种种污蔑和谣言，说国民党军队之所以要举行进攻，是因为解放区军民“放了第一枪”。可是谁都知道，解放区军民从来就只是从敌人手里收复国民党所抛弃的国土，并且在八年抗战中，始终把自己的武装队伍，限制在战区、敌人后方和陕甘宁边区境地内，从来不越雷池一步，从来就只有国民党军队向解放区“收复失地”，而解放区军民则始终顾全大局，退避三舍，只有到了让无可让时，才起而自卫。即在皖南事变中，新四军八千健儿惨遭聚歼的时候，中国共产党仍然相忍为国，致力于团结抗战，这也是世人所公认的。日寇投降以后，我们的枪口仍然是对着拒绝投降的敌伪，我们的一切战斗都是为了解放千百万沦陷区的同胞，这也是世人所公认的。为了避免冲突，中共中央曾命令新四军勿在京、沪、杭、甬等大城市与国民党军队争夺受降。新四军奉命北撤，国民党军队却到处尾追截击。各解放区军队节节退让，国民党军队却步步进逼，深入解放区腹地。谁放第一枪？谁在发动内战？难道还不明白吗？

国民党的宣传机关又污蔑解放区军民为“奸匪”，妄称解放区“秩序混乱”，口口声声说要“根绝”“清剿”。但是全世界、全国人民都知道，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其他人民军队从敌人手中光复了广大的土地，建立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权。一切新解放的地区，都在极短时期内，把敌伪的势力肃清得干干净净，建立了崭新的社会秩序，使人民生活走上正常轨道。例如烟台和威海卫的斐然成就，有登岸拜访的美海军将领作证，也

有当地盟国友人的言论作证，事实俱在，决不是恶意宣传所能抹煞。而骚扰我解放区，屠杀我无辜同胞，残害我抗属、伤病员、地方干部，惨无人道，形同土匪的，正是联合敌伪进攻我解放区的国民党军队，而不是其他。

国民党当局向解放区进攻的另一借口，是“军令政令的统一”。然而国民党当局对解放区所发的是些什么军令政令呢？国民党当局不对解放区军民发彻底消灭敌伪势力、建立民主政权、改善人民生活的军令政令。这些事情，解放区军民自己起来做了，国民党当局就大嚷着“违反军令政令”。而他们所发布的却是配合敌伪，“收编”敌伪的“军令政令”；是使吴化文、门致中、李守信、庞炳勋、孙殿英、赵保元以及其他大小汉奸头子得到高官厚禄，继续站在人民头上耀武扬威的“军令政令”；是使日寇保持武器、逍遥自在、收编日军为“中央军”“中国军”的“军令政令”；是嘉奖何思源之流，让他公开作无耻宣传，主张山东宁可让敌人占领、不可让八路军解放，并声称要和敌寇合作“根绝匪氛”的“军令政令”。这样奇怪的“军令政令”，全国人民是无法接受的。

不管国民党宣传机关怎样制造谣言，颠倒黑白，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解放区，他们不仅打了第一枪，而且企图“彻底根绝匪氛”，即完全毁灭解放区，这一事实是无法掩盖的。国民党当局想出很多“理由”，来为他们的进攻行动辩护，可是这些“理由”反而暴露了他们不可告人的隐衷：虽然签订了双十协定，可是绝不愿轻易放弃他们反人民、反民主、厉行独裁、排除异己的旧方针。正由于这种错误的方针还未被放弃，才有日寇投降以来国民党当局的一套悖谬措施，才“命令”解放区军队“驻防待命”，而邀请敌伪“维持地方治安”，才不允许抗战有功的解放区军民就地受降，而让曾以亲日派著名、抗战中屡战屡败的何应钦主持受降，才不承认解放区的民选地方政府，而委派了何思源之流的民族败类，才提拔汉奸，“收编”日寇，让他们继续践踏中国人民，才动员八十万军队，向解放区大举进攻，必欲将全中国仅有的一片光明地区加以“彻底”摧毁而后快。国民党当局这样的行为，危害了中国和平建国的前途，损害了国家民族的利益，违背了全国人民的意志。全中国人民和关心远东和平的各国人士，对于这样的行为，不能不起来反对。我们解放区军民，坚决避免内战，争取和平，但在国民党军队进逼太甚、让无可让的情形下，解放区军民不能不起而自卫，和全国人民一致制止反动派挑动内战的阴谋。为着国家民族的利益，这是我们应尽的义务。国民党当局为中国和平前途计，为本身利益计，应该悬崖勒马，立即停止八十万军队向解放区的进攻，立即停止一切违背全国人民意志的行为，并迅速履行双十协定。要知道目前的世界潮流和中国人民的意志是不可抗阻的，谁要倒行逆施，一意孤行，一定會在人民反对内战、保卫和平的长城面前碰得头破血流。

一年来的谈判及前途*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八日)

周恩来

一年来的情况很复杂，变化多端，现在只能把几个主要的问题说一说，把中国人民与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分析一下，同时讲讲前途。

一 一年来的谈判情况

日本投降后，国共谈判可分三个阶段来说：从去年八月二十五日党中央发表宣言、毛泽东同志去重庆直到年底，这是第一个阶段；第二阶段从政协到六月休战；第三阶段从七月大打到现在。三个阶段有很多区别：第一阶段是国共直接谈判，没有结果，打了三个月的内战；第二阶段各党派协商，得到结果，但由于国民党的反动，实际上已被推翻；第三阶段，谈判成为烟幕，实际上大打，证明谈判失败。这就是谈判各阶段的特征。现在分开来看：

第一个阶段。

抗战八年，赢得了日本的投降，当时的情况是：（1）日本投降后，人民非常希望和平，这是我们不能忽视的；（2）中共所领导的人民主力，还不能产生一个全国的民主政府，但又有部分的在我们领导下的民主政府；（3）只要中国人民团结起来，任何强大的帝国主义都可以打倒，这是八年抗战所证明了的。所以这三种要求——和平、民主、独立成为中国人民的愿望，我们根据此愿望，在去年八月二十五日发表了宣言，以适应这种要求，这是完全正确的。在过去大革命、十年内战、抗战三个阶段，我党就贯串了这个新民主主义的方针，那么在第四个历史阶段，我们更一定要贯串它。这是我党的历史方针，也就是毛泽东同志去年《论联合政府》报告的方针，在今后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要贯串它与实行它。

根据以上方针，毛泽东同志去重庆，在去年十月十日发表了双十会谈纪要。在此纪要中，解决了许多问题，但同时还有几个重要问题没有解决。

解决的最重要的有三点：

一、承认了中共的地位。尽管到现在，国民党在各地还捉杀我们的人，我们的党在蒋管区还处在地下，但中共在全国全世界的地位，从双十会谈纪要发表后，是不同了。

* 这是在延安的一次干部会议上的报告，其中第二部分是摘要。

我们的地位已为国内外人民所承认，这是历史上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十年前西安事变后，蒋还在庐山向我提出要朱、毛出洋的要求，把我们看成是地方军阀，污辱我党；抗战，我们向蒋提出国共共同纲领，他不理，自己发表了抗战建国纲领；抗战八年中，蒋对共产党无论在形式上本质上，都不是放在平等的地位。但在日本投降后，因为经过我们八年的努力，解放区有了一万万四千万人口，共产党军队达到了一百四十万的人数，中国的问题，要没有共产党的过问是不行的，因此，蒋也不能不一而再再而三地打电报请毛泽东同志去。毛泽东同志的去重庆是关系着中共在中国及在世界上的地位的问题，去年这一次去是完全需要的，对我们没有任何损失。虽然力量的发展是八年的成绩，但毛泽东同志去后就不同了，取得能适合我党现在力量的地位。所以今年九月蒋在庐山训话中说，中共已不象过去江西时代那样容易剿灭的，他是有了国际地位了。

二、承认了各党派的会议。在这以前，蒋根本不承认各党派地位，而此后却承认了，提高了各党派地位。历史的发展是非常之快的。党派会议、联合政府都是中共提出的，各党派今天之所以有地位，是共产党与人民的努力取得的，连青年党也不得不暗自说，因为有共产党才能有他们的地位。张君勱虽参加了“国大”，但在其见记者时，还说希望共产党原谅。这样使国民党不能一党包办，中国的事情，一定要经过各党派协商，这也就是实行了毛泽东同志的“三三制”思想。“三三制”有两个特点：一个就是共产党不一定要在数量上占多数，而争取其他民主人士与我们合作。任何一个大党不应以绝对多数去压倒人家，而要容纳各方，以自己的主张取得胜利。第二个特点就是要各方协商，一致协议，取得共同纲领，以作为施政的方针。这两特点是毛泽东同志“三三制”的思想。

三、承认了中共领导的人民军队的地位与数目。在此方案中，承认了我军二十个师。但抗战初期只给我们三个师；林彪同志去时，我们要九个师，蒋只给六个师；林伯渠主席去时，我们要十六个，蒋只给八个；毛主席去，一下就给了二十个师。

以上三点是双十会谈纪要的收获。我们并不因为蒋破坏了这些协定，就以为没有了收获。因为全中国人民都承认了这样的事实，认为中共的地位是不容抹杀的。国民党虽背叛了协议，但他还不敢放弃党派协商。

另一方面，没有达到协议的是地区问题与政权问题。在那时，我们的方针是要争取承认我们已有的民主政权，由此推向其他地方使之民主化。这对蒋来说，比前面的三个问题重大得多，因为凡是民主的地方，就没有独裁者的份儿。这对蒋是一个根本的威胁，因此蒋不承认。同时这也是与赫尔利闹翻的中心。毛泽东同志回来后，我与若飞同志还同国民党谈了一个半月。我们用各种方法想使他们承认，但他们还是不承认，中心就是他们不愿中国人民得到一个民主的根据地。中国这样大的国家，革命不可能是平衡前进，中国的革命就是这样的走出来，起起伏伏，一个阵地一个阵地地发展。所以对中国人民来说，根据地比什么都重要。武装固然重要，但武装毕竟是保持根据地的工具，武装脱离了根据地就无法生存。蒋看清了这点，他也特别懂得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因此，他无论如何不承认。

还有形式上承认而实质上未执行的问题，就是受降、遣俘、改编伪军三个问题。原则上虽已承认，但实际上他干他的。受降，他要经过美国人，而这样他的军队才由西南